

四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丞相趙忠簡公

公名鼎字元鎮解州人 崇寧五年登進士第

靖康中解潛為河東宣撫副使辟為勾當本司事

建炎二年為樞密計議官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

丞四年權簽書密院罷為提舉杭州洞霄宮 紹

興二年除知建康府三年除知洪州四年除參政

數月遷知院川陝安撫處置使俄改都督川陝荆

襄諸軍事未行留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五年兼左僕射兼樞密院六年罷為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七年復為左僕射八年加

特進請罷乃以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

府又罷為洞霄宮十七年薨年六十三謚忠簡

樞密張浚薦公公見浚首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

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趙鼎事實曰上度江

黃輿以鼎應詔鼎至杭聞復

公為司勳郎官以謂今目前之事眾所共知者人人能

言之乃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 祖宗

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

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

黨末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

和氣哉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四朝名臣言行錄》的傳藏和文獻價值

■ 朱銘堅

本文略述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藏、未知何人所編的宋福建建陽書坊刊本《四朝名臣言行錄》在明清以來的傳藏，再簡論其文獻價值。筆者指出此書自晚明至清中葉似曾一度在大內佚失，遲至光緒晚年才被重新發現並移至昭仁殿，輾轉為故宮所藏。昌彼得先生（1921-2011）早於1970年已指出宋本《四朝名臣言行錄》的獨特文獻價值在於其「所輯言行資料，多採自行述、行狀、奏議、及雜說筆記等，率據原文，並於其下註明出處。」然而或許由於此書久藏於深宮，不利研究者查閱，加上其部分記載較通行諸本《四朝名臣言行錄》為簡略，故利用此書作研究的學者寥寥無幾。筆者發現宋本《四朝名臣言行錄》所註明的史料出處，不單可補出土材料之缺，也有助探索宋元史籍中一些記載的史源。更為可貴的是此書所收錄洪适、史浩等三十六位名臣之言行獨見於此編而未見載於通行諸本，誠可謂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贅言。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有關人之「言行」的記載，始於先秦時期之「語」，如《論語》是「孔子及其門弟子之言行之依類纂輯者」，而《國語》則是「賢士大夫之言行，分國纂輯者耳」，其「記錄之意在傳其人之言行」。¹至於記載「名臣言之迹」的史籍，有學者認為其「作為一種歷史著作體裁，是由宋代大儒朱熹開創的」。²但就筆者管見所知，早於北宋（960-1127）中葉的王皞（生卒年不詳）已經收錄其兄、仁宗朝名相王曾（978-1038）的「平生言行，凡六十七事」，編成《王文正公言行錄》三卷，並邀得王曾的同僚葉清臣（1000-1049）為該書撰序。³及至南宋（1127-1279），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有感這些「多有補於世教」的名臣言行「散出而無統」，遂編成《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和《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以便記覽」。二書分別收錄北宋太祖至英宗（960-1067）五朝和神宗至徽宗（1067-1125）三朝的名臣言行，可謂集北宋名臣言行之大成。然而朱熹在編定《八朝名臣言行錄》後，「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故希望待將來搜集到更多材料後「續書之」。可惜的是朱熹在離世前仍未能完成這一心願，需待後人接續其書。

《四朝名臣言行錄》是後人接續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的成果。淳祐年間（1241-1252）趙希弁（生卒年不詳）所撰的《郡齋讀書志附

志》著錄《十二朝名臣言行錄》七十二卷一條云：「右八朝朱文公所編也，四朝乃後人所續者。」（《郡齋讀書志校證》，頁1134）可知《四朝名臣言行錄》最晚在1240年前後已成書。此書流傳至今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其一是故宮藏、未知何人所編的宋福建建陽書坊刊本，正集、續集和別集應各有十六卷，今僅存正集三卷，續集十二卷和別集十六卷（以下簡稱宋本）。這一版本很可能是建陽地區的書商據當時尚可見到的兩宋名臣言行拼湊而成。事實上，宋元時期建陽書坊編刻天水一朝歷史書籍蔚然成風，今天我們仍能看到宋建陽刊的《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與元建陽刊的《宋季三朝政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和《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便是當中的佼佼者。故宮所藏這一建陽書坊刊刻的《四朝名臣言行錄》，應是這一股刊刻風潮下的產物。⁴

另一版本則是題為李幼武（生卒年不詳）纂集的本子（以下簡稱李本），書前有趙崇鈐（生卒年不詳）所撰的序。就筆者管見，李本最早的是元刻本，內有《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八卷、《皇朝名臣言行別錄》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十七卷。昌彼得先生在1970年發表的鴻文〈跋宋建刊殘本《四朝名臣言行錄》〉已初步對比兩個版本的異同，並且對故宮藏宋本的刊刻年代和版本特徵有精闢的討論，今不贅述。⁵下文將略述此書的傳藏，再簡論其文獻價值。

明清以來的傳藏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謂「《四朝名臣言行錄》十六卷、《續錄》十卷」，注：「並不知何人編」。這一則著錄很可能沿襲自張攀（生卒年不詳）於嘉定十三年（1220）編的《中

興館閣續書目》，⁶可見此書在南宋晚年或許已為秘府收藏。南宋的宮廷藏書輾轉為元、明兩代所繼承。永樂年間（1403-1424），隨著帝都北遷，這批藏書也移置於北京的文淵閣。因典籍散亂無序，明廷遂於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命內閣大學士楊士奇（1365-1444）主持清點與編目的工作，最終在正統六年（1441）編成《文淵閣書目》。這一書目所著錄的《四朝名臣言行錄》共有五部，分別有二十四冊、五冊、十七冊、三冊和五冊，這大概反映了正統年間大內藏書的情況。此後不久，曾在「東閣為史官，日閱中秘書凡五十餘大櫥」的錢溥（1408-1488）也抄錄了一份宮中的藏書目錄。他在致仕歸鄉里後，於成化年間（1465-1487）編成《秘閣書目》一書，當中錄有《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冊。⁷

然而不知甚麼原因，此書自晚明至清中葉似曾一度在大內佚失。據學者劉仁的研究，《讀畫齋叢書》所收的《文淵閣書目》刊本出自鮑廷博（1728-1814）提到的「家塾舊藏本」，是明末在文淵閣進行藏書檢點時的核查本，故這一刊本所記錄諸書的殘存資訊，應是萬曆三十三年（1605）張萱（1558-1641）編《內閣藏書目錄》前宮中藏書的實況。⁸這部《文淵閣書目》刊本著錄的五部《四朝名臣言行錄》全都標示為「闕」，⁹暗示此書在萬曆三十三年前已在宮中消失，故張萱編的《內閣藏書目錄》未有錄入此書。到了乾隆九年（1744），宮中所藏的宋、元等善本被送至昭仁殿藏貯，而這批善本獲賜名為「天祿琳琅」。其後，于敏中（1714-1779）等大臣於乾隆四十年（1775）奉敕為昭仁殿所藏珍本編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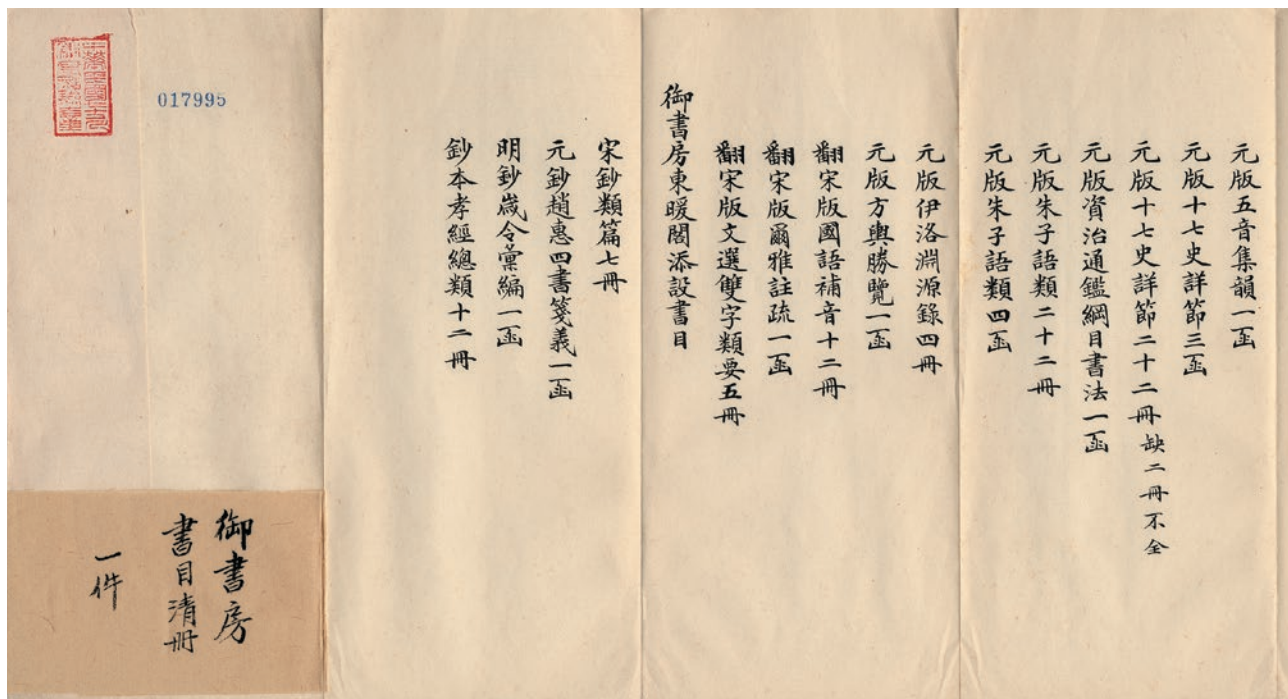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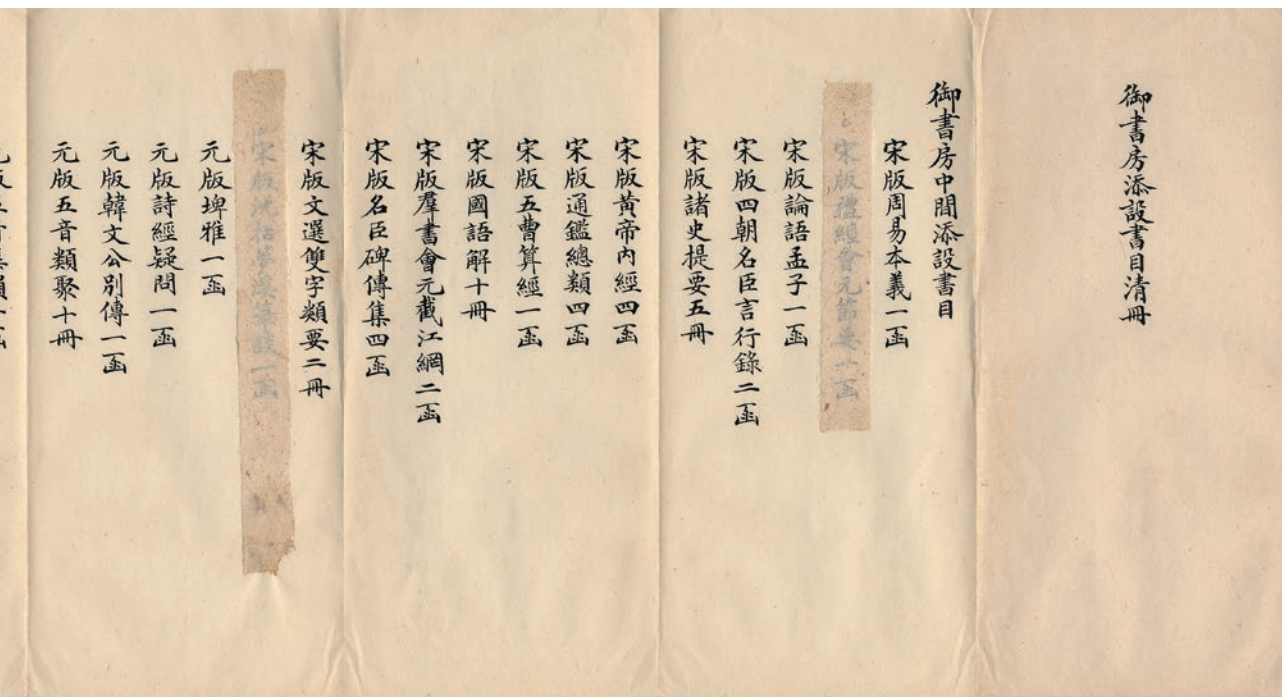
圖 1 清 宮中檔奏摺〈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 光緒 22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54311

不幸的是昭仁殿於嘉慶二年（1797）失火被燬，且殃及殿內藏書。彭元瑞（1731-1803）等人因此奉命蒐集整理殿中珍籍，繼而編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在這兩部天祿琳琅書目中，均未見《四朝名臣言行錄》的縱影。

遲至晚清，這部《四朝名臣言行錄》再次「重見天日」。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御書房添設書目清冊〉有「宋版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函」（圖1），¹⁰可知此書大概於光緒晚年才被重新發現並移至昭仁殿。清室退位後，此書為清室善後委員會掌管，其中一冊繫上「清室善後委員會」「日三〇五24」標記。192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著名藏書家傅增湘（1872-1949）於兩年後任北京故宮圖書館館長。傅增湘曾接觸過四部不同的宋刊本《四朝名臣言行錄》，其中一部是「高抵三寸」的「袖珍小本」

（宋刊巾箱本），其餘三部「一藏張菊生（即張元濟，1867-1959）家，一藏徐積餘（即徐乃昌，1869-1946）家，一藏故宮，雖板刻非一，然皆大字本。」傅增湘首次見到這部藏於北京故宮之中、「鐫彫精麗」的宋本是在1927年7月。他在《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中提到此書的版本特色：「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十六卷後集十六卷宋李幼武撰。宋末中字建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闌。鐫彫精麗，故宮藏。」¹¹

1929年，傅增湘選取了北京故宮所藏八十五部宋元珍本及影宋抄本的書影印出版，題為《故宮善本書影初編》，當中包括這一部《四朝名臣言行錄》。書影前附有各書的版本解題，由版本目錄學家張允亮編撰。張允亮對此書的版本有以下描述：「宋李幼武撰。宋末建本。



蓋與朱子《八朝名臣言行錄》合刻者。續集第十二卷闕，前人割裂第十一卷後半以充之。卷中有『蔡氏家藏』諸印記，原藏昭仁殿。」（《故宮善本書影初編》，頁6）

張允亮於1934年編的《故宮善本書目》中重申此書為「宋李幼武撰」，並增入了以下版本訊息：「宋建陽書坊刻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原闕續集卷十二。」（《天祿琳琅外書目》，頁2下）此書其後隨國民政府遷臺，續為故宮所藏。

文獻價值

關於宋本《四朝名臣言行錄》的文獻價值，昌彼得已畫龍點睛的作了以下概括：

此本所輯言行資料，多採自行述、行狀、奏議、及雜說筆記等，率據原文，並於其下註明出處。李幼武本則頗有刪削裁併，故不載明出處。自著作之體而論，此本輯錄稍濫，不如李幼武本之略具裁；而自史料之價值言之，李本則不及此本之高也。（《蟬庵論著全集·下冊》，頁636）

此書獨特的史料價值，或許可解釋為何昌彼得在與王德毅（1934-2024）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時，在相關人物的條目下註明《宋本四朝名臣言行錄》所收人物的卷數和頁碼，方便研究者進一步利用。儘管《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出版至今已逾半世紀，然而宋本《四朝名臣言行錄》卻鮮受學者關注，利用此書作研究的學者寥寥無幾。筆者懷疑是書除了因為久藏於深宮，不利研究者查閱外，也可能是由於研究者從書影初窺此書時，有見此書收錄人物「名不副實」，加上其記載較諸通行本（即以元刻李本為底本所衍生出來的衆多明刻、清刻、和刻及朝鮮刊

刻本）為簡略，故而得出此書史料價值不高的印象。

此書收錄人物如何「名不副實」？按此書題為「四朝」，所收的人物應為活躍於南宋高、孝、光、寧四朝（1127-1224）的名臣，然而從此書續集卷一的書影所見到的卻是活躍於北宋仁宗至神宗三朝的思想家、理學先驅張載（1020-1077），顯然絕非「四朝名臣」。再者，此書的張載小傳也較諸通行本簡略。宋本把張載及其弟張戢（1030-1076）的小傳合而為一，共一百一十四字（圖2）：

公名載，字子厚，秦人也。舉進士，為祈州司法叅軍。神宗召見，除崇文檢書，以疾求去。召還，同知太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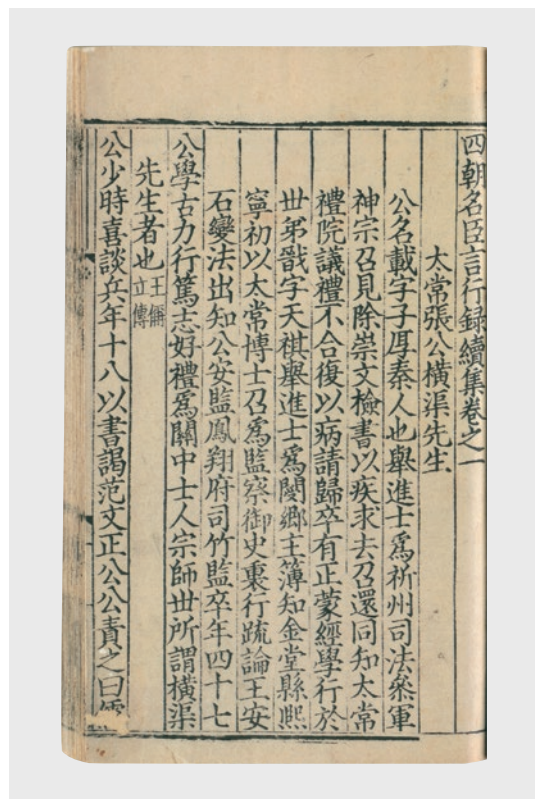


圖2 宋 不著撰人 《四朝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1 張載、張戢小傳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舊 001203

院，議禮不合，復以病請歸，卒，有《正蒙》，經學行於世。弟戢，字天祺，舉進士，爲閬鄉主簿，知金堂縣。熙寧初，以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裏行，疏論王安石變法，出知公安，監鳳翔府司竹監，卒，年四十七。（《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1》，頁1上）

而兩人在李本中各自有獨立的小傳，共一百四十八字：

張載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祁州法，遷丹州雲岩縣令，除渭州僉判。熙寧二年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張戢，字天祺，橫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陝州閬縣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博。熙寧二年，爲御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九年，卒，年四十七。¹²

通過比對上引和李本的張載和張戢傳，可知後者篇幅較長，清楚標出張載兄弟登科或任官的年月和卒時年歲，較詳盡地羅列兩人的仕歷，而列出的官名多是簡稱（如以「太博」簡稱太常博士）。宋本除了記述張載「有《正蒙》，經學行於世」這數語爲李本所無外，其餘內容與元本大置相同。從宋本書影所見張載小傳這個例子，不難得出此宋本的史料價值或許不太高這一結論。

昌彼得早已指出此宋本的價值在於「所輯言行資料，多採自行述、行狀、奏議、及雜說筆記等，率據原文，並於其下註明出處。」

如續集卷七的呂祉（1092-1137）言行，出自鄭克（生卒年不詳）撰的行狀多達十八則，而續集卷三所載的綦崇禮（1083-1142）言行，採自李益能（生卒年不詳）撰的行狀和周葵（1098-1174）撰的墓誌分別有九則和三則（圖3）。這些行狀的內容大都未見於它書，只有小部分散見於不同的史籍、類書和出土墓誌，如《全宋文》據《山堂肆考》、《翰苑新書》和《古今事文類聚》等類書僅輯錄了綦崇禮行狀兩則。¹³ 至於綦崇禮墓誌雖爲《臨海墓誌集錄》所收，但內容多有殘缺：

……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固……。

……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既失秦川之祠，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¹⁴

今據宋本所收綦崇禮言行出自〈墓誌〉的兩則記載，可補上引出土墓志之缺（圖4）：

公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固已得王言之體，而慷慨論事，無所回避，不虛爲帷幄侍從之臣。（《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3》，頁9下）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3》，頁11上）

此宋本所註明的史料出處，還有助探索宋元史籍中一些記載的史源，如下引《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節錄呂祉因鄺瓊（1104-1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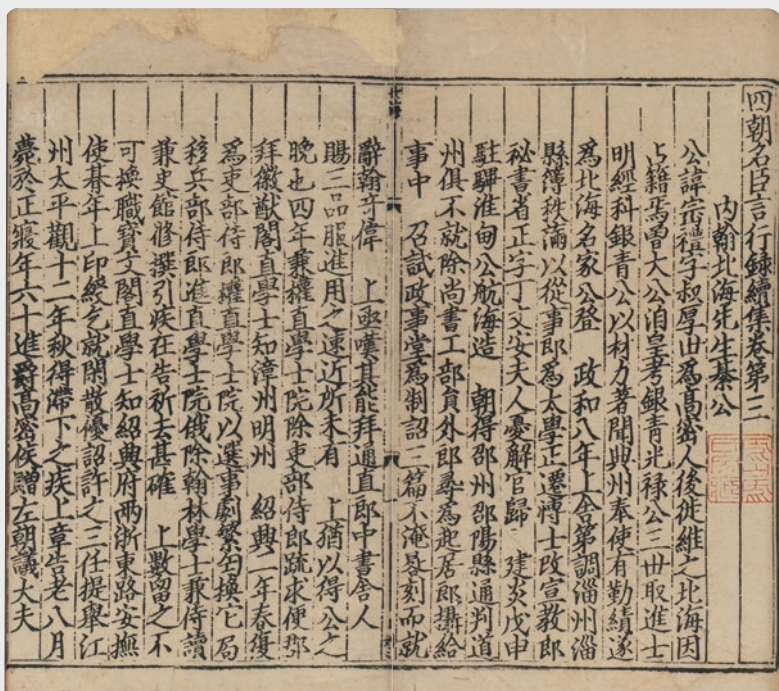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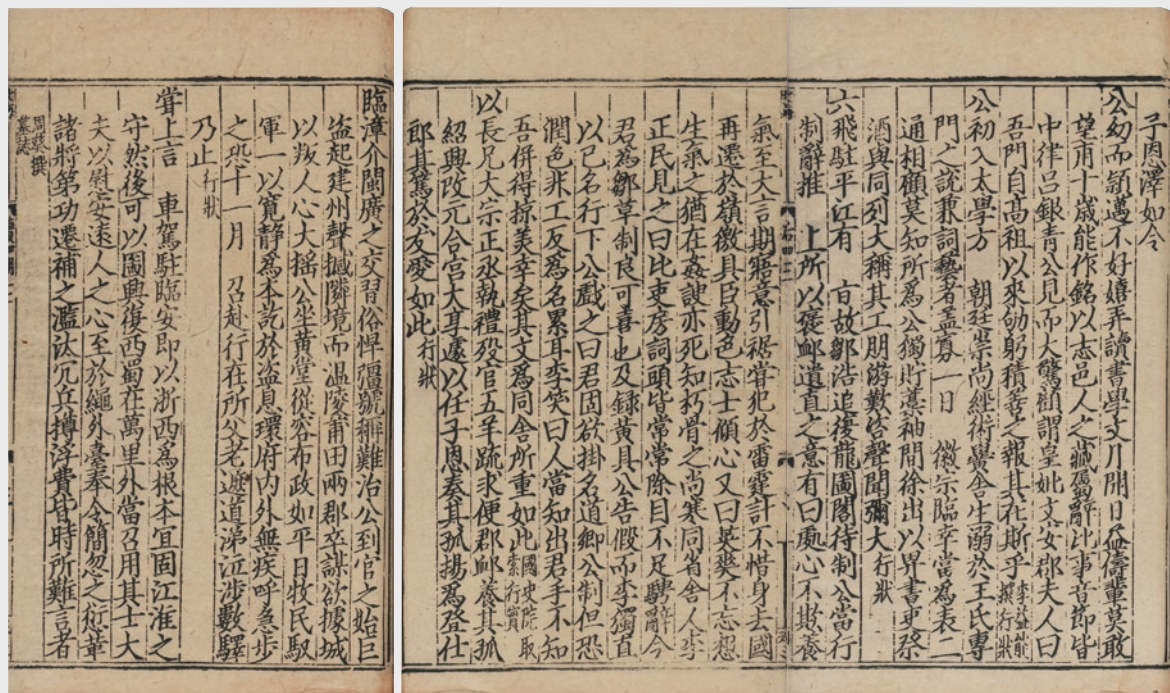


圖 3 宋 不著撰人 《四朝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 3 蔡崇禮文獻採自「李益能撰行狀」及「周葵撰墓誌」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1204



圖4 宋 不著撰人 《四朝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3 收錄周葵所撰蔡崇禮墓誌佚文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1204

兵變遇害的經過便是一例：

將渡河，社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社上馬，又翻身落馬，大罵曰：「我不比你幾個負國賊，我不去。」又謂其下曰：「你軍中豈無一個英雄？劉豫逆臣，不要隨鄺瓊去，從逆不是好事！」眾皆環立不行，瓊恐眾心動搖生變，乃遣人殺社，以其眾降豫。¹⁵

學者李寒簫在研究《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一書的史源時，已敏銳地察覺到以上引文與李本所記呂社遇害之事「相似度較高」。但由於呂社的「發言均是頗為淺近的口語，這

和《名臣言行別錄》（即李本）大不相同」，故推斷建陽書坊在編《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時「完全有可能接觸到與其（即呂社）生平有關的原始材料。」¹⁶ 宋本所載呂社遇害的經過，可為李寒簫的推論作一有力佐證（圖5）：

至三塔，距淮僅三十里，公下馬行數步，到一棗林邊，立語瓊等曰：「劉豫是逆臣，你卻降他，好事負朝廷。我如何見得劉豫？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數人縛公上馬，公又翻身落地，大罵瓊等曰：「我不比你幾個負國賊，天地不蓋載，我不去！」又語其眾曰：「你軍中豈無一箇英雄人？劉豫是逆臣，不要隨鄺瓊去，從



圖5 宋 不著撰人 《四朝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7 收錄鄭克所撰呂祉行狀佚文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1207

逆不是好事！」眾皆傷感，咨嗟涕泣。又有人云：「呂尚書說得是！」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生變，乃急策馬先渡淮，令王師晟、尚世元亟害公。行狀（《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7》，頁27下-28上）

與李本所記相比，上引宋本的描述不單更詳細，更重要的是其註明這則記載出自鄭克撰的呂祉〈行狀〉，據此得知《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和李本所記呂祉遇害一節應是出自〈行狀〉這一共同史源。建陽書坊在編書時得以採用建陽人呂祉的〈行狀〉，或許與〈行狀〉在建陽地區廣為流傳有關，因為該地的士人普遍視呂祉這名鄉賢為「忠臣」。¹⁷

除了明確標示資料出處以便考索史源外，宋本另一重要文獻價值在於其所收錄七十六位名臣的言行，「幾有半數為李本所未錄」（《蟬菴論著全集·下冊》，頁638），當中洪适、史浩、湯思退、張商英、趙挺之、崔鶯、陳次升、趙雄、王淮、梁克家、陳俊卿、袁樞、周嗣武、王十朋、周武仲、陳良翰、向滯、鄭丙、汪大猷、李燾、劉章、洪遵、周必大、陳居仁、趙思、蕭燧、程大昌、范成大、施師點、謝諤、王信、郭棣、余崇龜、倪稱、謝師稷、楊萬里共三十六人的言行僅見於此宋本，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今僅以續集卷二所收徽宗朝宰相張商英（1043-1121）的言行略作說明。這卷所錄的張商英言行共29則15頁，大部分內容未見

於它書。更難能可貴的是此卷多有註明所載言行的出處，如張商英的言行錄有1則出自行述、11則出自行狀、8則出自家傳、6則出自本傳，還有3則採用了疑為張商英自撰的《辛未入對語錄》和《無盡私志》（圖6）。一些張商英言行錄的內容即使為它書引錄，也較此書簡略，如南宋王象之（1163-1230）的《輿地紀勝》節錄了張商英《言行錄》兩則：

朱諤彈公紹聖初雖有章疏論列元祐官寮，本是姦黨，出知蘄州，遂列名黨籍。蔡京親書公姓名在司馬溫公之列，而天下反以為榮。¹⁸

崇寧五年，知鄂州。是時蔡京倡方田，且欲均天下賦稅，又築園土以囚罪人。公謝表有曰：「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鄉之惡。」此語一出，雖匹夫

匹婦，皆相傳以為口實。自是公名愈重於世。¹⁹

而宋本的張商英言行錄則云：

朱諤彈公紹聖初雖有章疏論列元祐臣寮，**原其心迹**，本是姦黨。**再謫知蘄州，罷為提舉舒州靈仙觀**，遂列名黨籍。京親書公姓名在司馬溫公之列，而天下反以為榮。行狀（《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2》，頁12下）

復通議大夫、知鄂州。是時京倡方田，且欲再均天下賦稅，**州縣吏挾牙儉持尺丈履畝而方之**，深山窮谷、不毛之田亦計其頃畝，民情惶駭，思亂者十室而九，**咸謂王莽之行井田，不如是之擾也**。又築園土以囚罪人，工役駭然，**過於城池**。公謝表有曰：「方田



圖6 宋 不著撰人 《四朝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2 張商英文獻採自「辛未入對語錄」及「無盡私志」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1203

擾安業之民，圖土聚徙鄉之惡。」此語一出，雖匹夫匹婦，皆相傳播，以爲口實。自是公名愈重於世。行狀（《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2》，頁12下）

對比以上引文，可知此書所載的張商英言行不單更充實（粗體字部分僅見於此書），還註明出自〈行狀〉，其文獻價值顯而易見。除了獨家收錄張商英等三十六人的言行外，宋本所載部分名臣的言行也遠比李本所記的詳實豐贍。如陳公輔（1077-1142）的言行同見於兩書，此本（別集卷二）共收入38則41頁，而李本（別集下卷五）則只有共13則8頁。更重要的是這些言行的出處在此本中大部分均有清楚註明，可是在李本則付之闕如。從這部宋本所見，陳公輔的言行包括5道撰於欽宗和11道撰於高宗

時期的奏議，另有5段和3段分別摘錄自〈擬試〉（圖7）和〈上殿劄子〉，還有部分節錄自陳公輔的〈奏劄〉、〈取士論〉、〈御將劄子〉、〈論攻守劄子〉、〈論恢復劄子〉、〈用兵劄子〉、〈論文〉等作品。此書所收陳公輔的奏議和論劄，部分散見於李本、《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鄂國金佗粹編》、《宋名臣奏議》、《宋史》和《歷代名臣奏議》等書，有一半以上未見於其他存世文獻。如能從此宋本中輯出那些李本所無的名臣言行，當可補《全宋文》和《宋文遺錄》之闕。²⁰

餘論

以上僅是筆者在臺三星期閱覽約三分之一部《四朝名臣言行錄》（約六冊）之後的讀書心得，



圖7 宋 不著撰人 《四朝名臣言行錄》 別集卷2 陳公輔文獻採自「擬試」 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1213

就管見所及略論此書的史料價值。由於時間關係，未能詳讀全書，特別是別集卷八至十五收錄的名臣言行，由於全都未見載於李本的《四朝名臣言行錄》，估計應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有待研究者進一步發掘和利用。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一般研究基金（General Research Funding）資助計劃「太學社群及其社

交網絡：南宋初年政治和社會新格局的構建」（計劃編號：17604320）和「稽古揆今：兩宋之際詞臣政治著述中所引的歷史典故」（計劃編號：17605225）的研究成果之一。承蒙黃寬重教授和曾紀剛博士之助，筆者得以閱覽故宮藏宋福建刊宋元遞修本《四朝名臣言行錄》一書，謹此致上最誠摯之謝忱。

作者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註釋：

1.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上冊，〈周官五史〉，頁 215。
2. （宋）朱熹、李幼武輯，李偉國校點，《宋名臣言行錄》，收入《儒藏（精華編第 151 冊）·史部傳記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上冊，〈校點說明〉，頁 1。
3.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9，頁 385-386。
4. 關於宋元時期建陽書坊編刻這些史書所採用的手法，可參閱李寒蕭，〈元代建陽書坊編刻遼金宋史風潮探蹟〉，收入包偉民、劉後濱編，《唐宋歷史評論·第十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頁 197-228。
5. 昌彼得，〈跋宋建刊殘本《四朝名臣言行錄》〉，《圖書季刊》，1 卷 2 期（1970.10），頁 75-78，後收入昌彼得，《蟬庵論著全集·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636-640。
6.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03，〈藝文二〉，頁 5123；馬楠，《唐宋官私目錄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0），頁 144-147。
7.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六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675，卷 2，頁 15 上；（明）錢溥，《秘閣書目》，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冊 277，頁 8。
8. 見劉仁，〈《文淵閣書目》版本系統考論〉，《文獻》，2019 年 4 期，頁 119-133。
9.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讀畫齋叢書本排印），卷 6，頁 74。
10. 故宮藏宮中檔奏摺，引自曾紀剛，〈「天祿琳琅」藏書史事補證〉，《故宮學術季刊》，40 卷 4 期（2023 冬），頁 179。
11.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卷 3，頁 207；《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4，頁 288-289 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5 上，頁 320。
12. （宋）李幼武纂集，《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初刻本），卷 4，〈張載〉，頁 1，引自《中華古籍資源庫·數字古籍》https://www.nlc.cn/pcab/zy/zhgj_zyk/（檢索日期：2025 年 8 月 18 日）。
13. （宋）李益能，〈慕北海行狀〉，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冊 241，卷 5400，頁 432。
14. 馬曜明、任林豪主編，丁俊點校，《臨海羣書集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 3。
15. （元）劉時舉撰，王瑞來點校，《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4，頁 92。
16. 李寒蕭，〈《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性質考索〉，《傳統文化研究》，2023 年 4 期，頁 148-149。
17. 呂祉的傳記在（景泰）建陽縣志被列入「忠臣」類，見（明）趙文、黃增纂修，袁銑續修，《（景泰）建陽縣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弘治刻本影印），冊 176，卷 3，〈史部·忠臣〉，頁 13 下-15 上。
18.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收入《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清道光二十九年甘泉岑氏懼盈齋刊本影印），卷 47，〈官史〉，頁 10 上。
19.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67，〈官史〉，頁 2 上。
20. 李偉國從宋本《五朝名臣言行錄》輯出李宗諤撰書彬行狀 9 條、劉貢父撰〈萊公傳〉5 條等文，另又從宋本《三朝名臣言行錄》中輯出韓琦〈家傳〉27 條、胡宗愈撰胡宿行狀 9 條等，補《全宋文》之闕。見李偉國，〈論《全宋文》及宋代遺文的搜集和整理〉，收入氏著，《中古文獻考論：以敦煌和宋代為重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 419-420。